

犹太难民流亡上海的政治背景 与差异性分析（1933—1945）

高辛凡^{1,2}

- (1.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 200241;
2. 《未来传播(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编辑部,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1933年自希特勒上台开始, 纳粹德国利用欧洲社会反犹思潮, 针对犹太人实施了一系列排犹政策, 包括没收财产、限制人身自由、驱逐出境等。约50万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在这一时期被迫流亡海外。由于中国上海当时无须入境签证、财产担保和工作证明, 对世界各国难民自由开放, 因此成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这场洲际大迁移中, 对犹太难民“零门槛”的避难地区。至二战结束前, 共计约3万犹太人从纳粹统治区逃至上海, 开启流亡生活。二战结束后, 几乎所有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都迁离上海, 定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以色列等国家。文章通过与流亡美国的犹太难民群体做比较分析, 总结出因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总体呈现出流亡人数相对较少、精英比例不高、本土化程度低、战后定居意愿弱等特点。

关键词: 犹太难民; 流亡上海; 政治背景; 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1) 02-0037-09

一、犹太难民流亡上海的政治背景

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开始, 到1938年10月, 纳粹德国通过订立一系列的反犹政策和法律条例, 逐渐剥夺犹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之后又进一步限制犹太人的人身自由和职业选择。1935年9月15日, 纽伦堡法律的颁布, 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反犹行动变得更加严厉, 纳粹大规模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境, 也承诺如犹太人自行离开德国, 便放其一条生路。因而在纳粹统治地区看不到生存与发展希望的数百万犹太人被迫走上了海外流亡之路, 成为国际难民。

然而, 纳粹对犹太民族的迫害远没有结束。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 在纳粹党人的怂恿和操纵下, 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 肆意破坏、抢劫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这一夜给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 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奥地利也有94间犹太教堂遭到破坏。这起残酷的、震惊世界的“水晶之夜”事件, 标志着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从限制人身自由, 升级到肉体的消灭摧残, 也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政府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在德国的犹太人可能随时随地被纳粹不明缘由地逮捕, 装上卡车送往集中营, 押进毒气室, 被残忍杀害。^[1]

纵观当时的世界背景, 面对愈演愈烈的犹太人难民潮, 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及时有效地伸出援手相助。“水晶之夜”后, 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处境, 没有阻止纳粹德国疯狂的反人道行为, 而是选择了沉默和忽略。同处欧洲, 在地缘上较近的英国

与法国各自穷于应付德国军事扩张带来的冲击和威胁，也不愿向纳粹统治地区的犹太难民群体伸出援手。

1939年5月，英国发表限制犹太移民的白皮书（政府官方文件的泛称），禁止犹太难民流入国内。波兰、罗马尼亚、巴勒斯坦等国家也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地。法国、西班牙、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犹太人开始另谋出路，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国家，其中，上海成为战火纷飞世界中一根救命稻草。^[1]就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拒绝接受犹太难民的时候，上海是当时世界上难得的也是唯一一个对外国人完全自由开放的大都市。对犹太民族的全盘接纳其实并非当时中国政府的决定，也并未受西方列强的逼迫，而是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使然。

上海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作为中国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对全世界开放。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作为特殊的港口码头，拥有号称“国中之国”的租界区。租界不仅成为西方列强盘踞的地点，也变相成为融汇各国难民的避难所。上海的租界在日军的包围下成为一座孤岛，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大量入侵，中国政府被迫在上海地区失守，无法行使任何职权。

1937年至1939年，外国人进入上海不仅不需要入境签证，而且无须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担保，甚至不需要事先觅得工作并出具警方提供的品行证明。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无疑为逃离欧洲的大量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2]而上海这座城市对于犹太群体来说并不陌生，上海对世界开放之初，富有经商头脑的一批犹太人已率先来到上海并建立起一些犹太社区。这部分犹太人与清政府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往来密切，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中国政府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援助。可以说，犹太民族与中国民族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为之后大量犹太难民的涌入及他们后来在上海生活时受到中国政府、工商界人士、普通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救助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时任中国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不顾中国驻德大使陈介的反对，冒着风险为犹太难民搭载前往上海的“诺亚方舟”提供了最大便利。他深知这些犹太难民不会永久定居中国，却仍发放签证给他们，供犹太难民逃离纳粹统治区。直至1940年5月何凤山回国，他共为犹太难民盖章签发了2000余份签证。被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认定为“国际义士”的何凤山代表中国人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帮助了命运多舛、颠沛流离的犹太民族，救下了一个又一个流亡的生命。纳粹在二战期间残杀了约600万犹太人，但逃亡上海的这批难民几乎都存活了下来。

二、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群体的成分与本土化分析

（一）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的组成和聚居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的犹太人主要由赛法迪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以及二战前至二战时流亡的德国、奥地利、波兰犹太人构成。早在19世纪中叶，赛法迪犹太人（Separdic Jews）就纷纷从印度、巴格达等地来到上海经商。这批犹太人大多以英、美籍为主，少数是伊拉克籍和职业发展较好的无国籍人士。这些地区当时都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这一批犹太人是最早来到上海定居的。凭借犹太人天生出众的商业嗅觉和经济头脑，其中的一批人逐渐发展成为富商，出现了一些赫赫有名的家族，比如哈同家族、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这些犹太家族的商业贸易活动对当时的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一定作用。

到20世纪初，大批的俄罗斯犹太人为了躲避沙皇的暴行和之后的十月革命，也陆续移居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等地，其中有一部分人南下到上海谋生。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批人的数量已经达到约4000人。^[3]其余的一部分犹太难民就是本文主要探讨的自1933年希特勒在纳粹统治地区实行反犹、灭

犹的政策后，逃离家乡故土，前往上海避难的犹太群体。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3年至1941年，犹太难民涌向上海的总人数为2.5万人左右。^①1940年，流入上海的犹太难民日益增多，日本操纵下的汪伪政府开始限制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同年，英国、法国对德国宣战，从意大利坐船逃亡上海的海上路线被切断。之后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开始减少。不过有一批来自波兰的犹太难民坐火车，从西伯利亚逃亡到当时的伪满洲国和日本，但日本没有收留，这批人后来也逃亡到了上海，其总数1000余人。^[3]

在全面抗战爆发及国家内乱的时局下，上海政府在一船又一船的犹太难民持续涌入后，成立了难民收容所，租界和教会及原本就在上海居住的犹太群体也积极从事难民的收容工作。在上海的犹太人，除了赛法迪犹太人大多数居住在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从欧洲成功逃亡到上海、当时几乎是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们基本集中居住在虹口提篮桥一带的舟山路、霍山路和长阳路。因为上海虹口区一带的房租低廉，食物价格也便宜，是乞丐及城市底层居民的聚集地。这一地带大约聚集生活了10000多的犹太人群体。^[3]

背井离乡、贫困无业的犹太难民不可避免地面临几个问题：流亡到上海后居住在何处？每天的食物来源如何解决？怎么求职谋生？毕竟，之前身居欧洲的犹太民族即使普遍积累了一定的财产，也多数被纳粹没收充公。流亡上海的寄居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从有产阶级返贫后白手起家、重启全新职业生涯的经历。

幸运的是，早已移居上海的一批犹太富商，如沙逊等人对同胞伸出了援手。他们在虹口区建造了一批食堂，将学校改造成临时宿舍，提供给犹太难民们，暂时缓解了犹太难民的食宿问题。^[4]随着流亡上海的犹太群体的日益增多，更多的犹太组织开始参加救助活动。比如，美国犹太人援助组织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建立了大量的难民所、流动医院和食堂，逐渐成为移居上海的犹太人最信任和依赖的救助团体。犹太人难民收容所每日提供8000至10000份的救济食物，当时大概有3000多人一直靠美国犹太人援助组织的救济生活。^[5]

（二）犹太难民的职业及代表人物

当时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群体中，不乏来自各行各业的技术或理论人才，相当一部分难民是医学、法律、艺术、工程等领域的知识精英。另外还有不少人是掌握一门技术或手艺的专业人才，在经商、服装缝纫、西点面点制作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当时的难民中有大批医护人员，仅内科医生就有200人。他们在1938年末，在难民营中建立了一个诊疗所，又在第二年建立了第一所难民医院，有60个床位。难民当中还有教师，他们后来成为当时两所接收犹太难民子女的学校骨干。他们当中还有记者和编辑，并创办了多份德文报纸和杂志。^[6]

流亡上海的犹太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当属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维纳·迈克尔·布鲁门塔尔。他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纳粹统治最残酷猖獗的时期，他的家庭财产被全部没收，父亲被关进集中营两个月。1939年，他们一家几经磨难，流亡到了上海。幸存的布鲁门塔尔在1947年前往美国学习经济学，1967年成为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1997年，他成为柏林犹太博物馆的馆长。布鲁门塔尔曾多次到上海进行“寻根之旅”，找寻自己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犹太难民集聚区生活了9年的记忆。“上海是世界上唯一愿意接纳我们的地方”，布鲁门塔尔回忆说。^[7]他对流亡上海的生活还历历在目，甚至仍没有忘记70年前学会的上海方言。布鲁门塔尔说，他在1939年随着父母和姐姐赴上海避

① 参见潘光著作《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难，曾经一度以送面包为生。他回忆，当年许多人挤在逼仄的小房间内，夏天的上海极热，蚊蝇滋生，冬天则是湿冷到令人瑟瑟发抖。但他说，自己在上海看到了人们在艰难困苦中，凭借爱、家庭、品行、勇气和坚韧不拔，仍能实现许多成就。

同样著名的还有雅各布·罗森菲尔德博士。他是一名奥地利医生，在上海租界开了诊所，因为医术高明而得以闻名。在上海生活期间，罗森菲尔德和记者汉斯·希伯相识。1941年，他在希伯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为第一个加入新四军的国际友人。1942年，罗森菲尔德又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医术高明，曾经救治过包括罗荣桓、方毅、曾炳华在内的多名中共高级将领。罗森菲尔德在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哈尔滨工作了3年。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返回奥地利。

美国流行艺术家彼得·麦克斯也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岁月，逃脱了纳粹的迫害。麦克斯出生于德国柏林，年幼时便跟随家人逃亡到上海，在上海虹口区度过了童年，抗战胜利后又随家人前往以色列。1953年，麦克斯随着家人移民美国。麦克斯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早期，对美国的广告设计界及包装设计界有着深远影响。

在上海开启了新生活的犹太人，积极勤劳地开始工作，善良的中国人民对这一苦难的群体也颇为照顾。虽然在当时的上海，本地市民也饱受战争的摧残和戕害，城市的大街上有冻死的、饿死的尸体是相当常见的现象。城市中的下层人士很多靠着做苦力，当挑夫、人力车夫等勉强维持生计。本地市民和犹太难民同受战争摧残，却惺惺相惜，互相帮助。据犹太人回忆，中国人民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会帮助犹太难民找到住所安置，帮忙找工作，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各种帮助，包括帮忙照顾小孩，借生活用品，中国店铺也会时不时允许犹太难民赊账，邻居间也会互相赠送小礼物。

（三）犹太难民的上海生活

据经历当时生活的犹太难民回忆，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即使狼狈逃往上海后，也依然保持体面，维持着讲究社交礼仪的原则。即使为了生存而颠沛流离，依然会在举止和穿着上，尽量保持与在欧洲正常生活时一样的端庄、优雅。流亡上海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犹太难民学会了在苦难中也保持一定的生活品质。男人们外出依然西装笔挺，女人们也没有放弃有格调的套装和高跟鞋。即使在没有公共卫生间，需要用木质马桶的狭小污秽的居住环境中，犹太人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敬畏和热爱。“虽然我们一家人并未住在条件很差的难民所，但那时上海虹口区的整体生活条件较差，水一定要烧开才能喝，瘟疫爆发的风险长期存在”，一位犹太人这样回忆。在他们的记忆里，“虹口区的弄堂总是弥漫着马桶的臭味，夏天偶然的一场大雨后，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属于上海的潮湿也几乎将人吞没”^[4]。

犹太人在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开始思索谋生的手段，有经商天赋的犹太群体到了上海这个“东方夜巴黎”之后得以施展才华。不少犹太难民在提篮桥附近开办了咖啡馆、餐厅、杂货铺、药房和面包店等作为营生方式。女人们在家缝制毛衣、帽子等售卖，男人们除自己做小生意之外，也有去中国商人开的公司打工的。在战争的硝烟下，没有人可以预测流离失所的日子何时能结束。经历过生死的犹太人在消费上也比较谨慎，除了生活最基本开销之外，习惯于将剩余钱财妥善储存。

被日军占领后的虹口区在战火纷飞中日渐萧条，犹太人的涌入和经营使得这个区域开始重拾往日的喧闹。德文成为平日常见的文字出现在这一区域，奥地利式的露天咖啡馆、餐厅成为街头巷尾的靓丽风景线，虹口区一带因此被称为“小维也纳”。虽然面对语言障碍、极端的贫困、蔓延的疾病和隔离，犹太难民在福利机构的支持下，还是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区。犹太人的文化生活相当繁荣：开设了学校，出版了报纸，在剧院上演戏剧，运动队参加训练和比赛，甚至餐馆中的歌舞表演也兴旺起来。犹太难民群体善于苦中作乐，或许是一种对他们流亡上海的生活的最佳理解。^[5]

犹太人在以自己的文化影响着上海的同时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熏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喜欢吃中餐，对“大饼油条”等中式点心有深厚的感情。不少人还会说一些上海话，起了中国名字，喜欢看中国的戏剧，甚至学了太极拳，所有的这些都是上海犹太人的上海故乡情。^{[6] (232)}可惜好景不长，就在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一开始对犹太人的进入持默许和鼓励态度的日本侵略者开始将魔爪伸向这一饱受摧残的群体。他们起初希望吸引犹太富商来上海，聚集外国资本，从这些富裕犹太人的资金和财富及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地位中受益。然而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上海生活的犹太人的生存日益艰难，日本侵略者将生活步上正轨的犹太人推入了更黑暗的深渊。日本人开始效仿德国，将虹口区的20000名犹太人赶进集中隔离区，用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规定在隔离区内的犹太人必须将自己的窗户玻璃漆成黑色，或者贴上黑色的窗纸，夜晚不能透出一丝光亮。据犹太难民回忆称，有犹太人帮助中国军队做炸药，被日军发现后毒打至半死。同时，日本兵又抓走上海的英美籍犹太富商，对他们施行严刑拷打、敲诈勒索。即使有侥幸逃脱或后来被释放的富商，也无力再支援犹太难民群体。日本又禁止JDC组织再从美国接收捐款来救助上海的犹太难民，这种种行为直接导致了犹太难民的流亡生活遭受重创。^[4]

与德国成为盟友的日本，在1943年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主要针对德国、奥地利籍的犹太难民。按照这一规定，居住在苏州河以南的犹太难民需要贱卖家产、店铺，在规定时间内迁入东起大连路，西至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邓脱路（今丹徒路），南至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的约5平方公里的40个街区范围内，这一带被称为“隔都”。隔都内各种传染病肆虐，包括霍乱、疟疾、痢疾等。这个隔离区主要通道用栅栏和路障封闭，并由日本宪兵把守，区内实施保甲制度，进出全部使用通行证。日本人挂名做管理社区的委员会的头领，实际由犹太人自己负责，包括检查出入的通行证，犹太男子都有义务担任“保甲”。这一隔离政策使虹口区内的犹太难民激增至约17000人。这些人中，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别占了约8000人、4000人、1200人和250人。^[3]

1943年至1944年冬季，是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记忆中最为严酷的寒冬。受困于时局，当时的各种救助委员会均濒临破产。供暖所需的煤炭严重匮乏，日常的生活用品和电力都实行定额配给。上海市民的处境也相当悲惨，且持续恶化。最不乐观的是城市中犹太难民的处境，至少有约6000人处于饥饿的死亡线上，约9000人没有固定居所。尽管条件如此艰苦，热心的中国民众还是为那些房屋已遭轰炸的犹太难民带来了食物，并且为隔离区提供了资金帮助。^[7]

三、与二战时流亡美国的犹太难民群体的比较分析

（一）与上海全盘接纳犹太难民迥异的排斥性政策

从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的反犹、灭犹政策使数百万犹太人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纳粹统治地区的犹太民族纷纷向世界各地迁移。十几万欧洲犹太难民迁移到了美国，带来美国第四次犹太移民潮，其中许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或领军人物，这为美国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撑。

不过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犹太难民全盘接收，反而实行了排斥性的政策。著名的例子是在1939年，载满逃难的犹太人的“圣路易斯”号客轮在纽约港湾被拒绝上岸。船只靠岸时，已经看到岸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的难民被美国移民局拒之门外，无路可退，只能原路返回，但在返回欧洲的途中被德国潜艇击沉，所有难民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美国针对犹太难民制定了严苛的移民限额制度，这导致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中希望移民美国的虽占了大多数，却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力改变命运。纵观二战期间，国际社会反对移民和反对犹太族群的情绪普遍高涨，在这一背景下，大部分美国民众反对政府放宽移民政策来接纳犹太难民。美国媒体对纳粹屠杀犹太民族的事实也大都选择视若无睹。事实上，在 1941 年之前，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出台任何救助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政策。^[8]

美国历史上有两次反对犹太人的高潮，这是由于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矛盾激化和爆发。在二战期间，美国收容的部分犹太知识精英为其带来了极大的军事、经济与文化红利，但美国总体接纳的犹太难民数量却远低于其可承受能力。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并没有起到维持世界秩序、抗议及抵制纳粹残暴野蛮的反人类行径的作用，实际上也没有把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关怀带给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群体。

（二）流亡美国的犹太知识精英数量最为庞大

1933—1945 年，包括原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里，共有 50 万犹太难民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 12000 名文化知识精英。而这 50 万人中，有 13 万人选择逃亡美国。

1933—1941 年，美国仅来自德国、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就达 104098 人，他们当中的 7.3%，即 7622 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 1090 名科学家、811 名律师、2352 名医生、682 名记者、645 名工程师、465 名音乐家、296 名造型艺术家、1281 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这意味着从德国、奥地利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驱逐的文化精英中，约有 63.5% 被美国所接受。^[8]

美国的高校体制对流亡的犹太精英们来说是相对友好的，因为它正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在 1899—1900 年，美国总人口为 7599.4 万，只有 237592 名大学生，总共占 18—22 岁年轻人中的 4.01%。而到 50 年后的 1949—1950 年，美国总人口达到 15069.7 万，大学生的数量已上升到 2659024 名，即上升到年轻人中的 19.27%。研究生的数量以更大的规模增长，它由 1890 年的 2382 人增长到 1950 年的 237208 人，即增长了大约 100 倍。”^[9] 这表明，当 20 世纪 30 年代初，纳粹政权在德国的大学里疯狂贯彻文化清洗政策时，美国的高校正在经历着一场从精英型教育向普及型教育的过渡。“到 1930 年，美国已拥有 246 所各类正规高校，以及总计为 27000 名授课者组成的教师队伍，其中 12000 名是教授。” 逃亡美国的学者中，包括 300 多名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美国学术界最早开始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使得这场逃亡变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转移。^[10]

（三）美国更吸引犹太精英群体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逃亡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包括精英群体在世界范围来看数量最多，美国的文化对知识分子群体也更为友善。在总体人数上，上海的约 3 万犹太难民则大约只有美国犹太难民的四分之一。而在精英人数占比上，也无法与迁移美国的犹太精英数量媲美。移民上海的犹太人大部分还是以平民阶层为主。这也是由流亡时机、自身知识与技能水平、社会关系、经济条件等众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首先，从文化及语言差异的角度，作为母语是德语的犹太人，精英阶层掌握英语或法语不足为奇。若他精通英语，自然会想要流入英语环境的国家，如若他的法语更流利，则会偏好法语空间。即使不会外语，还有瑞士等国家可以选择。通常精英阶层的人脉资源更为多元、优越，在对流亡国家的选择上相较于平民来说更为自由。那么，这类人士必然会优先选择地缘上更为接近的欧洲大陆，或者语言文化更有共同点的美国，而不是选择陷于战乱又有着文化隔阂的上海。

其次，从工作机会来看，德国在1933年以前已经是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良好的国内发展环境使得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未想过移居海外。如若不是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府反犹运动的客观逼迫，纳粹统治区的犹太人，尤其是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犹太精英群体不会放弃国内的优渥生活而逃亡海外。即使是被迫流亡，精英阶层也必然会考虑未来的职业发展，尽管美国的高校体系、日常习俗和德国不尽相同，英语也是德国人的第二语言，流亡者在美国仍有些许希望可以找到体面且收入不薄的工作。反观中国上海，犹太难民普遍不晓汉语，在当时文盲率极高、英语根本不普及的中国，想要从事专业技能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综合考虑之下，有能力、有条件的犹太精英阶层自然首选美国，只有少部分被迫来到上海避难。

最后，从历史背景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战火纷飞、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在国内刚刚经历纳粹排挤、清剿的犹太族群，尤其是社会阶层较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断然不会想主动逃往另外一个战区。事实上，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主要以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平民阶层为主，例如在中国商人开的工厂、商店打工，做手工补贴家用等。

（四）流亡美国和流亡上海的犹太人本土化程度比较

从本土化的角度来看，对于绝大多数有着普遍的集体心理的德国流亡精英群体来说，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著称的美国文化并不是他们所接受的，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厌恶，使得这个群体虽然不少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美国，而是带着矛盾的心理来对待自己的新居住地。

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在扩张的高校体制，给犹太精英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纽约当时有一所成人高等学院，叫“社会研究新学院”，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些长期工作岗位。美国科学界的一些领导人也通过报刊表示政治同情，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气氛，唤起了大量完全是非官方的援助意愿。一些美国大学，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甚至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流亡的犹太知识精英开始看到在美国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而美国精英阶层也开始意识到犹太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能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群体在二战结束后全部迁离，可见，他们基本上是将上海作为一个战时的临时栖息地和中转站。差异极大的中西方文化和生活环境，局限性较强的职业选择，中国政府战后的遣返态度，使得上海毫无疑问不会成为犹太人群体定居的主要考虑对象。

四、流亡上海的犹太知识分子战后去向

1945年9月二战结束，战败国日本投降后，中国军队接管了在残酷战争中解放了的上海，在上海的犹太人开始陆续坐船离开，他们中的大部分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定居，也有部分人去了南非和拉美国家。^{[6] (233)}

犹太难民离开上海几乎是必然的选择。首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始终存在，习惯了西方生活方式的犹太民族若有机会，仍然更倾向于在西方生活与发展；其次，即使大背景下的抗日战争及欧洲战事业已结束，但中国国内仍面临内战风险，饱经摧残的犹太难民彻底厌倦与反感战争，必然向往和平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空间；此外，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些亲友和家属没有逃离欧洲，或者逃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战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因此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必然急于探寻亲人的下落或者忙着与亲人们团聚；^{[6] (233)}最后，抗日战争结束后，出于包括安全在内的多种因素考虑，中国政府并不允许外国人继续在上海逗留。当时的国民政府规定，德国、奥地利籍的侨民，包括犹太人原则上应该遣送回国，这

项规定令德奥籍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度过了多年流亡生活的上海。只不过在经历过大规模屠杀、集中营和毒气室等纳粹种族主义暴行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愿返回自己的祖国。

犹太人离开上海也决非易事。当时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地有移民配额，规定移民地必须有亲属等限制。在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等地仍在英国的统治下，限制犹太人入境。即使后期以色列建国，移民人数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于是不少犹太人开始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亲友帮助及国际援助机构，移居去北美、南美、澳大利亚等地。有犹太难民回忆称，其家庭在二战后移民澳大利亚就几经波折。当时澳大利亚规定，移民必须要有亲属在澳洲，而且要在银行存款 100 英镑，这相当于当时的一年工资。这名犹太难民有个叔叔在 1933 年移民去了悉尼，他叔叔于是在银行存了 100 英镑，把他爷爷先接了过去，之后又将这 100 英镑取出，重新储蓄，再接走他的奶奶。然后再取出这笔钱重新存进银行以接收他们家其他成员。就这样反复操作，靠着这 100 英镑，把他在上海流亡的一家共 18 口人，都成功带入了澳大利亚。有亲友在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是幸运的，也是最早离开上海的那一批。而部分没有移民名额的人则暂时继续留在了上海。1948 年以色列共和国正式成立后，在以色列特派到上海的领事摩西·尤瓦尔的鼓励下，不少犹太人申请去以色列定居。

赛法迪犹太富商们从 1948 年开始撤离，失去了犹太资本的支持，犹太总会、犹太学堂、犹太医院和养老院等逐渐进入停摆状态。俄罗斯籍犹太人由于没有苏联国籍，且已经在上海落地生根，发展良好，一般都倾向于继续留在上海。不过由于二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提升，苏联又大力鼓励俄罗斯侨民申请苏联国籍，所以大约有 60% 的苏联侨胞加入了苏联国籍。同时，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开始紧张后，大批刚刚加入苏联国籍的犹太侨民不得不离开上海，启程北上回到苏联。

据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旅居上海的犹太人继续陆续离开上海，其中约 5700 人在 1950 年到 1954 年间前往以色列定居。据不完全统计，1946 年离开上海的犹太人大约 3000—4000 人，1947 年约为 8000—9000 人，1948 年为 5000 人左右，1949 年约为 5000—6000 人，1950 年是 2000 人左右，1951 年也在 2000 人上下。这表明，在 1946 年至 1951 年，离沪的犹太人总数为 25000—28000 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欧洲犹太难民。^{[6](233)} 数字显示，1953 年，上海的犹太人有 440 人，1956 年为 124 人，1958 年为 84 人，1976 年不足 10 人。^[10]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几乎已没有外籍犹太人在上海居住，仅有一名犹太人加入了中国籍。上海的犹太会社和犹太会堂，都随着犹太人的离去而逐一消失。

1992 年，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以色列和上海的特殊关系与密切联系开始为世人所知。2007 年，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以色列 26 个公司，向上海市虹口区的社区项目捐款 66 万元，借以感谢二战时期上海劳动人民为犹太民族提供避风港的情谊。2015 年，76 年前曾作为犹太难民聚会地之一的上海市虹口区白马咖啡馆和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翻新后重新对公众开放，用以铭记这一段历史。

五、结 语

从 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德国开始的对犹太人，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反犹、排犹政策及行动，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沦为难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逐渐流亡到世界各地。从比例和人数上来说，绝大多数有条件逃亡的犹太人选择了文化更为接近的美国，他们多数将美国当作可以考虑永久居住的新国度。其他人选择继续留在欧洲大陆和去往其他国家。

由于特殊的历史及政治背景，有约 3 万犹太人在无须入境签证的情况下逃亡到上海。他们以平民阶层为主，也有少量商人、高学历的知识精英和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主要集中居住在虹口区，并逐渐融入当地生活。但与美国相比，当时的美国因为正在不断扩张的高校体制，以及

让犹太群体更有认同感的文化背景，成功留下了大批知识分子，这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战争背景下的上海难以提供给精英人士合适的工作。文化背景的差异和语言的差异也使得犹太难民群体更多地将上海作为临时的避难所，并在二战结束后逐渐迁离上海，主要定居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以色列。综上，因流亡地“零门槛”吸纳难民、政治局势相对动荡且存在文化与语言隔阂，二战前与二战期间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总体呈现出流亡人数相对较少、精英比例不高、本土化程度低、战后定居意愿弱的特点。

“历史是一种记忆。当代人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其本质是讨论我们对这场结束于70年前的世界大战的记忆内容及其方式。”^[11]笔者论述与解读二战期间相对被人遗忘的关于一个空间和一个群体的一段历史，本质上也是希望为人们的二战历史记忆增添一个维度，引发一些关注。

参考文献：

- [1] 郝勇. 二战时期犹太难民来沪避难的原因 [J]. 黑龙江史志, 2014 (21): 133-134.
- [2] 王艳红. 上海：二战时期欧洲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J]. 社会观察, 2005 (12): 40-41.
- [3] 王晓东. 犹太人在上海的诺亚方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上海移民史及在上海的聚居区 [J]. 上海鲁迅研究, 2010 (4): 238-245.
- [4] 姚虹聿. 感谢上海：二战犹太难民追忆 [J]. 检察风云, 2019 (19): 78-80.
- [5] 赖浩然. 苦难中的温暖故事——上海曾接纳三万犹太难民 [J]. 档案时空, 2015 (11): 46-48.
- [6] 潘光. 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73-74.
- [7] 董莉英. 二战时期中国上海的犹太人 [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2005 (5): 61-64.
- [8] 李工真. 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J]. 历史研究, 2008 (6): 167-187.
- [9] 李工真. 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 [J]. 历史研究, 2005 (4): 143-164.
- [10] [美] 丽莲·威伦斯. 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 [M]. 刘握宇,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274.
- [11] 孟钟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冲突、呈现及其意义 [J]. 现代教学, 2015 (24): 10-12.

[责任编辑：赵晓兰]